

徐日升神甫及耶稣会在康熙宫廷 的传教努力

——中西关系中的不同利益和共存空间

Fr. Tomás Pereira, SJ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its Mission at the Kangxi Court: Diversity
of Interest and Shared Cross-yards of Survival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万德化著 郭颐顿译

Artur K. WARDEGA

作者简介

万德化，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Artur K. WARDEGA, Director, Macau Ricci Institute

Email: wardega@riccimac.or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the most decisive and controversial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Kangxi era (1662–1722)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the Portuguese Jesuit, Tomás Pereira (1645–1708). Tomás Pereira worked at the court of Kangxi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1673–1708). He not only forged a unique and privileged personal relation with the Emperor, but also served as an innovative musician and a skillful mediator on Sino-Russian affairs. While the names of such missionaries as Matteo Ricci, Adam Schall and Ferdinand Verbiest are well known, Pereira has been relatively neglected, and this paper seeks to redress that imbalance. Pereira was important as a musician and diplomat and was closer to the Kangxi emperor than any other Westerner, which enabled him to exer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s and also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Portugal in China. However,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he saw his efforts undermined by the damaging consequences of the papal legation to China led by 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Keywords: Jesuits, Kangxi reign, Rites controversy, Acta Pekinensia, Sino-Vatican relations

为纪念葡萄牙耶稣会会士徐日升神甫（Tomás Pereira）逝世三百周年，澳门利氏学社编辑了一本纪念学术文集——《红墙内外：徐日升神甫（1645-1708）、康熙皇帝和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①，2012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与诸多学术选集类似，该书源于2008年11月10-12日在里斯本^②和11月27-29日在澳门^③举行的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红墙内外：徐日升神甫（1645-1708）、康熙皇帝和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这两次会议旨在纪念徐日升神甫逝世三百周年，聚集了中西双方钻研清史、徐日升神甫及其耶稣会士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自北京、厦门、广州、浙江、合肥、哈尔滨、香港和台湾各大学和研究院的专家和学者分享了对耶稣会在华历史的兴趣及研究。学者们在清朝的汉语文献中发现了有关徐日升神甫及其事业的大量资料。来自葡萄牙、法国、德国、波兰、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的知名学者，也分享了他们独特的见解，并与中国同业进行了探讨。他们当中许多人对耶稣会及其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本次会议再次表明，早期耶稣会士在传播基督信仰的同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情谊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是中国最杰出和开明的君主之一，

^① Artur K. Wardega, S.J. and António V. de Saldanha, ed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 S.J.,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②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elebrating the 3rd Centenary of the Death of Thomas Pereira, S.J. [Simpósio Internacional Comemorativo do 3º Centenário da Morte de Tomás Pereira, S.J.]

^③ 本次会议的组织方包括澳门利氏学社、里斯本科技大学社会及政治学院东方研究所、里斯本大学理学院科学史中心；合办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耶稣会中华省和葡萄牙省、耶稣会历史研究所以及东方基金会。

因其高尚的文化品味、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及敏锐的政治触觉，耶稣会士得以进入其宫廷和朝堂。这种宽容度最为充分地体现在 1692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宽容诏令》（Edict of Tolerance）中，诏令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和办教。这种对西方不同寻常的开放姿态使天主教在华传教工作蓬勃发展。同时让西学在中国得到认可，并巩固了澳门作为欧洲在华贸易中心的脆弱地位。

徐日升神甫（Tomás Pereira）在康熙宫廷服务 30 多年（1673-1708），和康熙皇帝建立了独一无二的私人关系，享有一定特权。他是一位很有新意的音乐家和干练的中俄事务协调人。他重建了北京天主教南堂，兼任钦天监监正，还是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有效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仔细探究这位葡萄牙传教士杰出的历史和社会贡献，其神圣天赋和个人成就，可以一窥康熙王朝的统治和在华耶稣会情况。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起初耶稣会士的期望和努力是帮助中国士大夫及其民众理解和分享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知识。在这方面他们吸纳了一些儒家价值理念，如“学”（learning）、“友”（friendship）、“诚”（personal integrity）和“恭”（obedient service）等，将儒家思想作为与金銮宝座沟通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在分享欧洲知识和个人才能的同时，他们也吸纳接收了中国风俗和传统。在朝廷供职能保护尚在萌芽阶段的基督教生活方式和在华天主教传教任务。徐日升神甫在耶稣会受训期间获得的智慧和敏锐洞察力赋予了其真诚自然的宗教修养，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史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学习儒家伦理和清朝习俗时，徐日升神甫慢慢引起康熙帝的注意并获得宠信。与此同时，在欧洲的伏尔泰（Voltaire Jean-Marie Arouet）对路易·库辛神甫（Father Louis Cousin）和让·德·布吕

默(Jean de la Brume)编写的《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①印象深刻,写下了这句话:“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②这首诗用来形容孔子和徐日升神甫的人格和使命都很恰当。

1675年,27岁的徐日升神甫从澳门被召到北京紫禁城。正如其名“日升”所预示的那样,此后他获得康熙帝的特殊宠信,北京其他耶稣会士也因为他而同获殊荣。1712年徐日升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徐日升神甫比康熙帝大九岁,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帝师。他们亦师亦友,关系密切。皇帝对徐日升神甫高尚的道德品质极为欣赏,将他视为忠诚的仆从及坦诚的挚友。皇帝甚至把国家的命运托付于神甫之手:徐神甫被派遣至俄国并成功的缔结了尼布楚条约(Nerchinsk, 1689)。现代史家认为相比后来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这还算是一个平等条约。他还最终说服康熙帝为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颁发了《宽容诏令》。

尽管如此,后人依旧难以细述这一历史相遇。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教士和一位接受中式教育的清朝皇帝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相遇、相交并相知?为何康熙帝不仅和神甫倾心交谈,还愿意把捍卫帝国利益的大事交托于神甫?

在研讨会上,这些事件及其他很多历史趣事均被与会著名专家学者研究和展示出来,研究成果亦被收录入本书。但正如鲁保禄教授(Paul Rule)为本书所著序言所述,至今尚未为徐日升神甫写一

^① 本书于1688年在巴黎出版,一年前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翻译出版了法语版《论语》。

^② 伏尔泰颂孔子诗,原文为“De la seule raison salutaire interprète, Sans éblouir le monde, éclairant les esprits, il ne parla qu'en sage, et jamais en prophète; Cependant on le crut, et même en son pays.”本处译文出自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2页。[M. De Voltaire, *Zhe xue ci dian*, trans.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1), 322.]

本传记，也未完整整理其所著书目。近年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徐日升本人仅出版了两本中文著作，稍后出过几份拉丁文和葡萄牙文作品。但是他留下了大量手稿，记录了他为清廷皇家事务奔波的旅程、讨论传教事工的书信、在面对非葡裔甚至是罗马代表的指责时为葡萄牙传教士热情辩护的文稿，以及介入保护受威胁的基督徒等等事迹，这些都值得学术界关注并应该整理出版。

此外，本书收录的论文仔细审视了徐日升神甫在朝廷与众官员的接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研究康熙朝廷内部及官员的运作^①。徐日升神甫不只是传教士和官吏，还是康熙家臣、近臣以及“外国专家”。我们越来越清楚发现，徐日升神甫在清廷是和天子最亲近的欧洲人。他曾与康熙帝有很频繁的个人对话，但不幸的是，神甫只记录了或向其他人透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康熙帝对神甫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神甫对康熙帝的评价都显示了彼此间相互深厚的敬意。

如今人们对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人耳熟能详，却似乎遗忘了徐日升。本文正是力图弥补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徐氏作为音乐家和外交家的作用十分显著。他与康熙帝的亲密程度是其他西方人难以企及的，以至于他能对皇帝施加一定影响，为中国基督徒争取保障，并且推进了葡萄牙在华利益。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却亲眼目睹了自身的努力如何被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率

^① 本书作者包括美国乔治敦大学魏若望（John W. Witek, S.J.）、美国旧金山大学利氏学社鲁保禄（Paul Rule）、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社会及政治科学系东方学院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科学系科学史中心雷恩礼（Henrique Leitão）、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学的费尔南多·里贝罗（Fernando Ramôa Ribeiro）、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史委员会的林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耶稣会中华省的詹德隆（Louis Gendron, S.J.）、耶稣会葡萄牙省的迪尼斯（Alfredo Dinis, S.J.）、罗马耶稣会历史学院的麦柯国（Thomas McCoog, S.J.）、葡萄牙东方基金会林若翰（João de Deus Ramos）、澳门利氏学社冼丽莎（Tereza Sena）、葡萄牙金国平等。

领的罗马教廷使团破坏殆尽。

徐日升神甫在这一历史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新生的中国教会更是极其重要。铎罗特使本人将出使失败完全归咎于葡萄牙耶稣会的恶劣影响，但使团和耶稣会双方的详细记录显示，徐日升神甫曾多次警告特使，他的建议一直被忽视，最终特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下片段选自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编撰的拉丁文手稿《北京大事记》^① (*Acta Pekinensia*)，从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后人争议颇多但依然鲜为人知的中西关系史高潮时刻。

《北京大事记》^② 386-391：科依主教颜珣热河觐见康熙皇帝记，1706年8月2日

8月2日那日，皇上从御餐台亲选两道酒菜，差人与欧罗巴人送去，旋即又命全体见驾。陛下皇恩浩荡，通览全局，预知那些从未觐见圣颜之人可能不识礼节，因而可能受到朝中大臣的轻蔑与耻笑。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康熙帝命巴多明神甫(Father Parrenin)教习至显科依大主教(the Most Illustrious Lord Bishop of Conon)、方舟神甫(Father Guéty or Fam Cheu)、薄贤士神甫(Father Beauvossier)等人礼仪，而后觐见之时，神甫之一必须行礼如仪，言行举止要为他人表率。教习完毕，至显科依大主教、毕天祥神甫(Father Appiani)、方舟神甫、李安琪神甫(Father Angelita)、安多神甫(Father Antoine Thomas)、薄贤士神甫、巴多明神甫

^①《北京大事记》(*The Acta Pekinensia*)是一份长达1400多页的手写报告，记录了1705年至1712年铎罗使团访华期间发生的事件，原稿现存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耶稣会专门设立一国际项目，拟将其刊印。澳门利氏学社负责该报告的英文翻译及注释。详情请参阅：<http://www.riccimac.org/gb/acta/>。

^② Artur K. Wardega, S.J., ed., *The Acta Pekinensia*,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Macau: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甫，以及两位已在皇帝身边伴驾两月的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及龙安国神甫（Father Antonio Barros），在两位满大人引领之之下步入皇宫。行过跪拜礼，皇帝问满大人，颜瑯（至显科依大主教）和方舟神甫是否会说汉语？答曰会说一点。因陛下尤其想对那两个人说话，于是令他们跪听圣谕，其他人则恭立一旁。陛下令跪着的人趋近龙椅，以便听得明明白白。接着便是双方的问答。为了避免对此后发生的活动的解释出现任何含混，笔者准备以对话形式来描述整个觐见过程，以字母“E”^①代表发问的皇帝，字母“R”^②则代表答问的科依大主教。

123. 颜瑯与康熙讲汉语，彼此如坠雾里

E：你可读得懂汉籍？

R：聊聊^③（只一点点）。

E：铎罗（又称多罗，枢机主教）引荐时，称你饱览汉籍，朕是以宣你到此。想必读过《四书》？^④

R：是。

E：可曾记得些许？

R：不。

E：读过但未背诵下来？

R：欧洲人没有背诵的习惯。

在上述几句言语交流的过程中，双方均试图努力理解对方。科依大主教说，他只懂得皇帝所说的一半，即便皇上发音清晰，谈吐优缓。^⑤然而，以免这样还无法让对方听得明白，皇上又命巴多明

^① 拉丁语中以“I”代表“皇帝”，此处改为“E”。

^② 原文中通篇使用“Rχ”这个缩略词指代“回答”，此处易为“R”。

^③ 原文为“Lio lio”，即“聊聊”。

^④ 原文“Su Xu”，即 Si shu，英文为 The Four (Confucian) Books。

^⑤ 颜瑯是在福建及其周边地区传教，熟悉闽方言而非普通话，说的汉语可能有口音。

神甫趋前翻译。实际上，巴多明在各种场合都作现场翻译。除了某些机要场合，为了避免先入之见，神甫请科依大主教尽力地向皇帝说明其意。现在书归正传。

E: 如此说来，你连《四书》里的几个字都说不出？

R: 科依大主教背出书中的两三个字，随即词穷语竭。

皇帝轻声接口说出该书后面的几字，以资鼓励，但收效甚微。科依大主教一语不发，皇上随口吟出该书几近三页。他转身问安多神甫，欧罗巴人是否需背诵什么知识的。神甫跪答，欧罗巴人必记之物固多，但也有许多其他东西是不需记忆的。皇帝见不把书本放在科依大主教面前，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故问：

E: 可知如何读我们的书？

R: 一点点。

E: 看到你对面朕顶上挂的那幅字了吧。上有四个大字，读来一听。

124. 他不认识那三四个汉字

R: 第一个是“华”字，第二是“阴”，第三字不识，第四个是“过”。^①

E: 没错吧？第一字是“华”，认得不错；第二字为“岩”，非“阴”。第三字是“云”，第四字是“搁”，而非“过”。华岩云搁^②。此四字何解？

R: 不解。

E: 四字尚且不解，何以解我诗书？朕知此事难为你了。

^① 原文为“*Hoa, yn...ngo*”，铎罗的随员 Ilarione Sala 称，那四个字的意思分别为“花、山、云、睡”。参见 J. M. Planchet,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aris: L. Michaud, 1923), 192.

^② 原文为“*Hoa yen yun go*”，疑为“华岩云搁”，均为普通汉字。

吾人埋头攻书五十载，尚需查阅辞书，考究疑难。说着，陛下用手指了一下摆在四周的典籍。

R：若是贵国学士苦读五十载后仍会遇到疑难段落，那么似我这等目不识丁的洋人，不解上述四字含义，就不足为奇。乞陛下勿以在下的无知而感到不快。

E：你不知，朕不怪。可是铎罗（枢机主教）称你饱读吾国诗书，熟谙吾国民情，可用圣人教诲来解释所有这些你认为与贵会教法相左的问题，这又为何？

R：这事怪铎罗本与我不识，我等素未谋面。

E：朕看今天之事难缠！倘若你能写下你的想法呈上，朕可即刻答复。而今朕如何与你会商？你不能读写，与你讲话，真如对牛弹琴。朕能写什么？朕又能对你说些什么？

巴多明神甫对科依主教说：你最近呈上的奏章，称吾国种种教义，大有不当，其实里面谬误百出。请看此处。你称“月令”^①为孔圣人所作，因其收入《礼记》。但不知你错了。圣人并非该文作者，而是另一个叫吕不韦^②的人作的，和圣人可是相去甚远。我们承认，他的说词不乏可贬之处。我等尊他，盖因其文采华丽，并非看重其说教。存其著作，仅为其文采而已。

R：我知道该文并非孔圣人而是吕不韦所作，可是它收在《礼记》当中，而《礼记》又是文学的传经之学。

E：你何以得知？

R：在下是在一本题为《性理大全》^③的巨著中看到的。

^①《月令》为《礼记》之第四篇（应为第六篇——译注）。

^②吕不韦（公元前 291?-235），战国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据称为秦始皇之父，广招天下游士，著《吕氏春秋》，是为《礼记·月令》篇的出典。

^③《性理大全》为《四书》及其他典籍的权威注解，成书于明永乐（1403-1425）年间。

- E: 在该书何处? 说来听听。
- R: 不记得何处或原文了。
- E: 朕再说一遍, 此人的著述留存至今, 只是为了其生花妙笔。你递来的奏本, 谬误百出。
- R: 奏本所书, 全是书里找到的原述。
- E: 这算什么回答? 依朕经验及你所说, 你不通诗书。因而可以说, 你的所言并非自己所知, 而是人云亦云, 拾人牙慧。
- R: 没错。我虽反对那些观点, 实非发现谬误的第一人; 初到贵国之时, 那些教我汉语的师者就曾说过, 所有这些都是不值一文的。^①

125. 皇帝证明颜瑄无知

- E: 若真如你所述, 他们便与你一样无知。为何让别人把观点强加与你? 如朕说, 你递来的奏本是对的, 你作何判断? 如朕说, 那满篇都错, 你受了小人的欺骗, 你又作何判断?

科依大主教踌躇了一阵, 静静地想了半天, 这才作答:

- R: 我写的那些问题, 似与鄙教不合。
- E: 要知合与不合, 先必弄明事理; 显然, 你并不明白那些你着人写的东西。
- R: 在下倒是略知一二。
- E: 皇帝笑言: 略知一二! 你既然连一半都不知, 仅凭你的一知半解, 岂能做出确定的判断? 若是朕对汝教之事也是一知半解, 又妄图插手, 那你会如何看朕?

^① 颜瑄一语不慎, 招致其中国师爷后来受审和受罚。

R: 在下虽然学识不多, 但心里觉得是那样。

E: 你说什么? 还未明白事情的根本, 便能对事件做出决定? 你还没有学会写字, 也不懂识读(汉语), 你对我国诗书的讲解从何而来? 仅凭东鳞西爪的微末了解, 就想仓促做个判断不成? 我们的诗书你不能辨别真伪, 不知何为真正的学说, 何为修辞比喻; 也不知谁为名家鸿儒, 谁是无名鼠辈, 你有何权力对本国的信仰指手划脚?

对于上述问题, 科依大主教一个字也答不出。皇上继续问道:

E: 在你所说的那些邪事当中, 为何不提那三个有争议的问题, 即是敬天、尊孔和祭祖? 难道你觉得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邪?

R: 有人劝我不要写在奏本里面。

E: 即便你没写在奏本里, 也没有论及此事, 可实际上你是写了。因为这些观点隐含在你写的东西里。是以朕要问你, “敬天”二字有什么邪? 难道是因为这个词里的“天”字, 不指“天主”?

R: 不指“天主”。

E: 这真是奇了! 难道我先前没告诉过你, “天”即天主本身, 是对“神”的美称, 比你在本国用来指神的什么“天主”或“天地万物之主”不知要好多少? 是因前一词仅指“天的主宰”, 而第二词则是“天、地以及万物之主宰”; 可是“天”就是“天、地和万物生灵之主”的意思。你说为何大家称朕为“万岁”, 一万岁? 依据贵教教义也属错行, 因朕还没到一万岁。

R: 这一称呼表达了臣民的心愿, 希望皇帝陛下万寿无疆。

E: 正是如此。那么你就学一学, 在我国语言里, 字词和

礼仪都是不能仅凭字面含义来理解的。我等举行礼仪尊孔祭祖，为的是向他们表达尊崇之意和敬爱之心。现在说来听听，朕所言可有错处？依贵国教义，我国伦理教法中有哪一条有错？错从何来？是否从利玛窦（利神甫）开始至今？你可曾读过利玛窦的书？这段话经巴多明神甫翻译，正如其翻译前文一样，用的是利玛窦的汉名，而非原名。

科依大主教转身向巴多明神甫问道：“神甫，这个‘利玛窦’是什么人？”神甫告诉说，利玛窦是 Matteo Ricci 神甫的汉名，刊刻在他的著述封面。他在书中证明，“天”或“上帝”既非物质之天，“理”或“太极”亦非人造。^①利氏书中所著，不仅有科依大主教颜珰想要摈弃的，而且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向整个欧洲宣扬其摈弃的中国学说。当科依大主教醒悟过来，巴多明神甫所说的“利玛窦”即是 Matteo Ricci 神甫，而且皇上问他是否读过此人在其汉语著述中对“天”的释意之后，便回答说：“在下未曾拜读过陛下所说的那本书。”^②

E：利玛窦及其伴当两百多年前来到本国。^③至那时，我国民众才知晓耶稣基督以及天主之名，盖因天主并未在我国疆土上化身显灵。

^① 参阅：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Chinese-English edition), trans. Douglas Lancashire & P. Hu Kuo-chen. Edward Malatesta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ciety, 1986). 利玛窦通过摘引中国经典著作将天主教的“天主”与中国古代的“天”和“上帝”概念等同起来，但同时将之与宋明理学中的“理”和“太极”等概念区别开来。他认为“理”和“太极”属于物质概念。

^② 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③ 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时澳门已有耶稣会士，而且自16世纪50年代以后抵达广州。皇帝的记事至少差了50年。

126. 皇上解释了一些汉字的词义

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为何我等无权称“神”为“天”？现在“神”不给这样称了，这究竟为何？

R：道理在于“天”非“天主”，创造“天”的，才是“天主”。

E：皇上厉声地说：朕已与你说过，“天”和“天主”含义相同。然后他话锋一转：“我等尊孔为师，乃是向他表达对国人谆谆教诲的谢意。我等祭祖，并非是为了求荣求贵。听着！你向朕提出的问题有三点。若你对此心存不满，请考虑打道回国。如若那些已然接受贵教教法之人看到你们内部发生争端、不和及纷争，他们会对贵教心生疑窦，别的人就不太可能接纳它了。实话告诉你，朕本人就觉得，你来我国之目的，不是为着固教，而是为了毁教。倘若贵教在华一切努力都化归于零，担此重责之人，唯你而已。

127. 颜瑯主教哑口无言

至显科依大主教无以作答，陛下在接见过程中略一停顿，两名御先^①立即过来跪下，口中奏称：“今日陛下仁心浩荡，为其欧罗巴人谋利，已是劳心劳神，尽显大恩，而彼欧罗巴人不识好歹，自毁事业。恳请陛下勿再徒劳智慧，费神垂询这个目不识丁的冥顽老儿。”皇上对着他们莞尔一笑，再次对科依大主教说，“好吧，我们把这事给结了。你想和朕就汉籍经典来一场辩论？”

R：我不想作任何辩论，因为我根本不是与陛下辩论的对手。

^① “御先”为大内要员。即御史大夫。

128. 汉字“天”的含义

此后，皇上第一次问薄贤士神甫：“你对‘天’及其含义有何说词？”神甫答曰：“‘天’为‘一大’^①，或先于天地万物的存在，‘天’生天地以及天地包含之万物。”

E: 颜瑯你对此有何反驳？

R: 我无法反驳，是因我愚钝无知，不是专家，何以能够参与辩论？

E: 其他的在华西人也像你一般想吗？还有谁对本国事务的学识更博？

R: 当然有的。

E: 他们现居何处，都是哪些人？

R: 不知道。

129. 皇上证明刘应神甫不全通汉籍

E: 对欧罗巴人而言，汉籍确实难懂。朕亲自考校过人称博览汉籍的刘应^②，发现他并不全懂书中义理。

此后，皇帝陛下拿过一张写有四行字的纸说：“朕查了你的名字‘颜瑯’二字。你是否知道第二字之意？”

R: 知。

E: 何意？

R: “保护”之意。

^① “一大”或为“天”的误解，源出《说文》，《康熙字典》沿用。

^② Claude de Visdelou, S.J. (1656-1737)，汉名刘应，他在北京仅短期逗留，没有记载表明他被皇帝考过，但白晋（Joachim Bouvet）在其日记中称，1693年皇太子曾考问过刘应的汉学知识，除对《易经》有一些意见分歧之外，考试顺利通过。参阅：Joachim Bouvet, *Journal des voyages*, ed.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88-90. 皇上已被告知，刘应对礼仪之事持不同看法（See *The Acta Pekinensia*, 261），而且还向铎罗举荐颜瑯，称其为中国文学专家（*The Acta Pekinensia*, 232,234），是以皇帝对他带有先入之见。

E: 非也。此字贱, 不宜用作教士名。^①

130. 科依主教不知其汉名之意

R: 在下初到中土, 就给起了这个名, 虽然有人说“瑯”字有“宦官”之意, 却也不敢再改。

充当翻译的巴多明神甫没有向皇帝转述: 科依大主教说“瑯”有“宦官”之意, 因为那是一个错译。该字不是描述性的, 而是一个在中国曾被万人唾骂的宦官之名。此人葬送了大明帝国和汉人江山。薄贤士神甫和巴多明神甫一得机会, 就向科依大主教作了两遍解释。

皇上问及方舟神甫的汉名。方舟神甫虽然说了自己的汉名, 但因发音不准, 皇上听了一头雾水, 直到引领我们前往见驾的发音更准的满大人重复了“方舟”之后才罢。皇上转向大主教, 问他现居何省。

R: 福建省。

E: 该省有多少你的教徒?

R: 约有 5000。

E: 这些人是赞同抑或反对你的看法? 他们是否反对敬天, 反对祭祖, 和反对尊孔?

131. 颜瑯承认不知道他的基督徒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恪守中国礼仪

R: 我不认识住在福州城外的鄙教信徒。他们净是穷人, 地位低下, 也没有那些供奉牌位的祠堂^②。我也的确不

^① “瑯”是一种坠子, 常为玉质, 用作护身符。曾为指某一宦官名。但是皇帝似乎指的是其前意, 是因他觉得有些迷信意味。

^② 参阅: *Acta Pekinensia*, 318, n.14. 虽然有钱人才能另辟一堂或一室供奉祖宗牌位, 但颜瑯并非不知普通家庭也设有神龛或祭坛, 他有意在此回避皇上的问题。

知他人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E: 假设一下, 倘若朕令满大人彻查此事, 发现你犯有欺君之罪, 那又该当如何?

皇帝言毕, 唤过引领我们觐见的满大人来说: “先带此人下去, 而后朕再降旨于卿等。”所有参加觐见皇上的欧罗巴人, 随着赵大人和赫世亨 (Henkama) 大人一齐退下。在笔者转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之前, 有一个遗漏问题尚未纳入上文, 在此补充。

皇帝问科依主教: “为何你的奏本中写了那些与贵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又未作任何解释?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倘若你和你的基督徒从不做那些事, 倘若你和你的基督徒又不必做那些事, 那么那些事与你和你的基督徒有何相干? 譬如, 为何你要写拜山神河神? 若要谈论吾国人的一切所作所为, 你定会发现中土有许多事情与贵教不符。难道你不知道福建有座庙里供着一尊猴神? 难道你不知道此猴神的来历? 难道你在那里住了这么久还没拜过猴神?”

言毕, 皇上望着徐日升神甫道: “你有没有在办差途中对沿途的神像磕头跪拜? 安多, 朕命你用几何术测量 NN 山时^①, 难道你没进入山顶寺庙敬香? 两位神甫一言不发, 同周围哈哈大笑的宫人一起大笑着。但是科依大主教对第一个问题, 即为何在他写的奏本中提到与他自己和基督徒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始终未答一字。

言归正传。

^① Father Antoine Thoma, 汉名安多, 是一位数学家, 皇帝曾多次钦命他进行地理勘测。康熙巡狩满洲时, 安多和其他耶稣会士伴驾在侧, 所到之处, 无不进行地理观测。皇帝此处可能指的就是那些事情。安多是于 1702 年精确测量某一纬度的第一人。参阅: J. W. Witek, “The Role of Antoine Thomas, S.J., (1644-1709) in Determining the Terrestrial Meridian L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eds. W. F. Vande Walle & Noël Golver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9-103.

132. 随众人退下之时，（颜珰）献上薄礼

同时，至显科依大主教命人向皇上敬献薄礼，如一盏银丝制作的小灯，一面背后绘有精美图案的小镜子，鲜花，香水等，总计 8 件。皇上收了小镜，其余奉还。^①此后不久，赵大人奉御旨讯问科依大主教，是否擅长某门科学？未得肯定答复。于是赵大人再问，是否通晓哲学？答曰：“是。”赵大人说，“那么再容我等问一个问题，看你是否能够详解。”大主教答道：“这些东西是我 25 年前学的，现在不知是否还能记得准确。”稍后，科依大主教用欧洲话补充道：“我如此回答，是不想让他们问我天文学^②方面的刁钻问题，因为那门功课我学得不好。”赵大人问大主教的第三个问题是，是否研习过神学。赵大人提问时按照欧洲习俗用“超性”一词^③来指代神学。科依大主教未答，是因他没听懂这个名词，而且似乎与他被问到的科学分支也不相干

此类课题与天主教传华史、中俄外交接触史、中国西方科学史、思想史及艺术史息息相关，并已引起欧洲、美国、中国等地学界的极大兴趣，在前述的文集中有更多、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译者简介

郭颐频，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GUO Yidun, Associate Professor,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flsgyd@mail.sysu.edu.cn

^① 据宫廷的待客礼节，礼物的收受或奉还反映了对送礼人的认可程度。

^② 拉丁语原文还包括“*Meteora*”一词。假如颜珰说的是法语，他可能用的是“*météores*”一词，意指任何外星天象。他害怕皇帝考问他的天文学知识，会使他与耶稣会士相比之下相形见拙。

^③ “超性”或“超性学”，可译作“*the nature of transcendence or the Transcendent*”，是对“神学”一词的常见译法。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ouvet, Joachim. *Journal des voyages*. Edited by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 Planchet, J. M.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Paris: L. Michaud, 1923.
- Ricci, Matteo.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Chinese-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Douglas Lancashire & P. Hu Kuo-chen. Edited by Edward Malatesta.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ciety, 1986.
- Walle, W. F. Vande & Noël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ardega, Artur K., S.J. and António V. de Saldanha, ed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 S.J.,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 Wardega, Artur K., S.J., ed. *The Acta Pekinensia*.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Macau: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
- Witek, J. W. "The Role of Antoine Thomas, SJ, (1644-1709) in Determining the Terrestrial Meridian L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Edited by W. F. Vande Walle & Noël Golvers, 89-103.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Voltaire, M. De. *Zhe xue ci dian*. Translated by WANG Yansheng. Beijing: Commerce Press, 1991.]